

再论戴震学术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 漆永祥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在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中,戴震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对象之一,也是引起争论较多的学者。本文就戴氏《七经小记》、《经考》与《经考附录》、《声类表》与《转语二十章》、《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等书籍与文章,以及戴氏早年与晚年的学术取向等,在前人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梳理与考辨,以期厘清误解,并希望能对戴震学术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戴震;《七经小记》;《经考》;《转语》;理学

在对清中叶学者的研究方面,戴震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因为无论是重义理还是重考据的学者,都能在戴震的著述中找到感兴趣的论题。与此同时,关于戴震学术的争论也较其他学者为多。本文试就戴震研究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尝试做一些考辨与分析,以期厘清误解,还其真面目,并对戴震学行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七经小记》蠹测

戴震一生虽颠沛流离,不遑安居,但治学勤谨,著述丰硕,达40余种之多。段玉裁认为其师最重视然尚未卒业者当为《七经小记》之撰写。戴震之“七经”指《诗》《书》《易》《仪礼》《春秋》《论语》《孟子》,即“五经”加上《论》《孟》,这反映了戴震对《孟子》的高度重视。

作者简介: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学术史、清代考据学、朝鲜《燕行录》研究以及中学语文教学与语文高考研究等。

但戴震《七经小记》的撰写方式,并非诸经之综论,或者是专经之考辨,依段玉裁的叙述,戴氏意欲分为《训诂篇》《原象篇》《学礼篇》《水地篇》,最后以《原善篇》综括之。至于为什么戴震要采取如此的方式来撰写《七经小记》,他的《与是仲明论学书》其实就是最好的回答。他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又曰:

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槩,毫厘不可有差。……^[1]

戴氏举例说明了博涉与专精的关系,也论述了从训诂上升到义理的治学次第,《七经小记》就是围绕这一见解而设定的撰写方式。稍后的凌廷堪也分戴氏之学为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而又云戴氏“地理之学,仅《水地记》一卷,礼经及钟律之学未著书,故不得论次云”,“而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旨,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2]。段、凌二人所论,与戴氏之意大致相合。我们试推衍其书之梗概如下:

1.《训诂篇》

戴震有关小学训诂的著述,代表作有《声韵考》4卷、《声类表》9卷(即《转语二十章》)、《方言疏证》13卷。在古韵分类上戴氏继顾炎武十部、江永十三部、段玉裁十七部之后,提出了九类二十五部的分类方式。在声纽研究上,他将三十六字母分为二十章,又分大限五(大类),每大限下设小限(小类)各四,声韵结合,匠心独运(详下节所论)。而《方言疏证》及其具体治学中的训诂成绩,则是其声韵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而已。

2.《原象篇》

戴震天算学的研究,深受梅文鼎和江永的影响,代表作有《原象》《续天文略》《考工记图》《策算》《勾股割圆记》以及对《算经十书》的校理等。《原象》讨论的是地球、月球、太阳三者之间的关系,恒星天的问题,授时以及天文学总论等问题。《续天文略》是续郑樵《通志·天文略》之作,汇集古书中有关天文资料,

是一部古代天文通志。《策算》论西洋筹算的乘、除、开平方法。《勾股割圆记》是戴震精心结撰之作,全书上篇介绍三角八线与平三角形解法,中篇为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为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戴氏将西方三角函数用中国传统代数方法求解印证,力图证明“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3]。不仅如此,他还自创一套术语,如角曰觚、边曰距、切曰矩分、弦曰内矩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立法称名,一用古义”^[4]。这点曾受到凌廷堪的批评,但足见戴氏西学中源、倾心古学的思想。

3.《学礼篇》

《学礼篇》其实就是名物典制之学,戴震的代表作有《考工记图》《经雅》《记冕服》等。他注重古代礼制名物,是他认为能有益于当今,所谓“古礼之不行于今已久,虽然,士君子不可不讲也。况婚冠丧葬之大,岂可与流俗不用礼者同?”^[5]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去详考礼制的原因。如他对《考工记》中兵器、车制、食器、宫室、明堂、宗庙、井田等古器物制度,一一详考并用图详晰地画出,俾后人参考。今收录于《戴东原集》中的《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洫之法考》《乐器考》《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髻》《记经带》《记纁藉》《记捍决极》《辨诗礼注軌軌軹駟四字》《辨尚书考工记鍤錡二字》《释车》《羸旋车记》《自转车记》等篇,应该都是《学礼篇》的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推测其规模之大概。

4.《水地篇》

戴震的地理研究一方面受《水经注》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直承郑樵,采取以山川为主考察郡县沿革的方法。《水地记》完全按此方法理论来编著,虽仅成一卷,但仍能窥其主导思想。此书起始即论“中国山川,维首起于西,尾终于东”。戴氏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大陆地势西高东低、山川走向由西至东这一总体特征。然后,其记载从黄河河源昆仑山开始向四周扩展,先叙述由昆仑发源之水及与之相关的大山,再由黄河上游向下游延伸,叙两岸支水、支脉,以干水系支流,主山系支岭,间有对前人错讹的考辨与纠谬,泾渭分明,脉络清楚,有条而不紊。戴氏采用《水经注》体例,认为“北方之水莫大于河,而河已北、河已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矣;南方之水莫大于江,而江已北、江已南众川因之得其叙矣”^[6]。此可见《水地记》之规模宏大,可惜只存创例,未得完成全帙。而其乾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的修纂,以及《水经注》的整理与研究,则又是其具体治学实践的运用。

5.《原善篇》

戴震终生一以贯之的是他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次第,亦即由考据而上推义理的思想与实践。他认为道存于六经中,“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7]。他作《孟子字义疏证》诸书,一是他强烈的闻道目的,即所谓“明孔孟之道”^[8];二是为了批判宋明理学,并提倡自家的义理之学。钱穆论《原善》颇似受

惠栋《易微言》之影响,且成书于见惠栋后,扩大成三卷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之事,至于《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则成书更后。冒怀辛论戴震此数种书成书次序为:《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与钱穆之说相合^[9]。戴震建立义理之学所采用的方法,是试图将义理建立于考据基础之上,这既是对宋明学者空衍义理的反动,也是他考据为义理服务思想的印证,即他所谓《原善》“比类合义,粲然端委毕著,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但戴氏由训诂以通义理的实践并不成功。^[10]

从上述论述我们可窥知,戴震《七经小记》各篇的撰著架构,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有继承又有创新,始于训诂,终于义理,虽然全书未成,但从其遗著可了解其梗概。其实如果将这些著述稍加别白整理,则《七经小说》全书就呼之欲出了。

二、《经考》与《经考附录》

戴震著述经段玉裁整理为《戴氏遗书》,由孔继涵《微波榭丛书》刊行,但所收尚多遗漏。民国间《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中,收有戴氏《经考》与《经考附录》,今黄山书社1994年版《戴震全书》,二书皆收录于第2册中。

《戴震全书》的整理者,在《经考》前面所撰《说明》中,介绍《经考》时叙及其特点有三。其第二、第三点曰:

(二)《经考》集中反映了戴震早期的学术路向。即早期戴震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徒,是程朱唯心主义理一元论的信奉者。其主要体现是:①从对待历代思想家的态度来看:在《经考》中,戴震先后引用西汉以来七十多位学者的言论,内中除江永称“先生”外,另有四人称“子”,即北宋二程、张载和南宋朱熹,其他学者均直称其名。从中可见,戴震对程、朱等理学家的尊崇。②从学术立场来看:在《经考》卷一中,戴震除竭力称颂程朱“复《易》古本”外,还在卷五《春秋考》中颂扬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而对反对程朱理学者则持激烈的批评态度。③从哲学思想看:在《经考》卷一中,戴震对程颐的《程氏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多有肯定。尤其在“理、象、数”条中,戴震对《程氏易传》所言的“有理而后有象”、“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等唯心主义观点极表赞成,详加摘录。……(三)《经考》对新安理学家十分重视。从南宋朱熹、程大昌到元明时陈栋、胡炳文、赵汭、朱升以及清代江永等人的言论作了较多札记,这就为研究戴震思想渊源及其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11]

又,整理者在《经考附录》之《说明》中,亦下结论曰:

《经考附录》更鲜明地反映了戴震早期的学术路向,反映了戴震对程朱理学持坚定信仰的态度。^[12]

案《经考》5卷,凡摘录历代著述中有关《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与《尔雅》之说,按小类汇编而成。“先后引用典籍达七十多种,作者七十多人,共六万余字。另有‘按语’四十八条,约一万二千多字”^[13]。《经考附录》7

卷,先后摘录典籍更多达 100 余种,涉及西汉以来学者 170 多人,总字数在 10 万字以上。其卷帙内容次序大同于《经考》,唯卷 7《石经考》,为《经考》所无。

实际上,《经考》及《经考附录》,与惠栋《周礼会最》《汉书会最》等书性质完全相同,即其书只是戴震研究经学的参考资料集,而绝非专门的著述。试各举《经考》与《附录》卷一所录条目为例。《经考》卷一主要辑诸家论《易》之说,小标题分别为:

重卦、三易、易取变易之义、象辞爻辞、九六七八、十翼、易为卜筮而作、理象数、卦变、互体、宋儒复易古本。

全卷共 11 小标题 60 余条,所录有张怀瓘、程大昌、王弘撰、顾炎武、《周礼》、程迥、胡瑗、程子、朱子、《乾凿度》、孔颖达、刘安世、沈括、《史记》、《汉书》、《三国志》、《隋书》、吴仁杰、阎若璩、冯椅、俞琰、苏轼、汪永、李鼎祚、王应麟、尤袤、董真卿、洪常、吴肃公、朱彝尊等诸家之说,其中包括戴震自己所加按语数条(不重复计算,下同)。

《经考附录》卷一亦为摘抄诸家论《易》之说,所列小标题为:

重卦有四说、连山归藏、易一名而函三义、易象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题周以别前代、周易上下经、卦名、汉初传易、焦延寿京房之易、王辅嗣韩康伯注易、子夏易传贗本、河图洛书、大衍、先天后天、太极图、程子易传、朱子周易本义、言古易者各易。

全卷共 18 小标题 90 余条,所录分别有扬雄、《汉书》、淳于俊、孔颖达、干宝、梁元帝、《北史》、《隋书》、邵子、王观国、《中兴书目》、罗莘、朱彝尊、《乾凿度》、郑玄、张子、陆佃、罗泌、黄宗炎、王弘撰、陆德明、程子、龚原、胡一桂、俞琰、吴沆、《史记》、晁说之、赵汝楫、叶梦得、顾炎武、欧阳修、张璠、《唐会要》、孙坦、程迥、陈振孙、朱子、徐善、阎若璩、王湜、邵伯温、王申子、叶绍翁、刘因、袁楠、《朱子语录》、薛瑄、《宋志》、邵博、李焘、周燔等诸家之说,包括戴震所加按语 4 条。

案整理者将戴震所纂之资料集,当成是他的专著,故有如是之说。其实《经考》的《说明》中列举的几条例证,都不足以证明“早期戴震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徒”。整理者认为,戴震尊称二程、张载与朱熹为“子”,表明了对他们的尊崇(整理者未注意到,戴氏书中对邵雍也称“子”)。众所周知,明清以来学者,称此数人为“子”,已经由“尊称”而变为“习惯”。不仅戴震,即批驳宋儒更烈之惠栋及其他考据学家,亦称程朱诸人为“子”,因此不能说戴震对程朱称“子”,即是对他们的尊崇。

整理者又认为,《经考》卷一中,戴震对程颐、朱熹之书多有肯定。对《程氏易传》所言的“有理而后有象”、“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等“唯心主义观点极表赞成,详加摘录”。考戴氏原书,“宋儒复易古本”条中,只是摘录尤袤、董真卿、洪常、吴肃公、顾炎武、朱彝尊等诸家之说,末戴氏按语一条,亦仅叙吕微中考定古《易》之年代及董楷变乱朱子《本义》之事;“理象数”条中,摘抄了程、朱二氏论“理象数”之观点两条,戴氏并无一字进行评价。需要明确的是:戴氏书的

性质是钞撮资料,只不过是罗列诸家之说,并无褒贬寓其中。因此可以说是对程氏之说“详加摘录”,但绝不能说“极表赞成”。

又整理者因《经考》引用了朱熹、陈栌、胡炳文、赵沅、朱升以及清代江永等人言论,故得出戴震“对新安理学家十分重视”的结论。其实戴氏所引,远自先秦,下迄当时,多达“七十多人”的观点,《经考附录》甚至罗列“一百七十多人”之说,朱熹等人只不过是这一百七十多人中的数人而已,我们无法由此判定戴氏对新安理学家的重视,更无法从《经考》及《附录》中寻觅到戴氏“早期的学术路向”。

因此,戴震《经考》与《经考附录》,只不过是戴氏早期寻常之读书札记,严格地说是经学资料集,凡摘录自秦至清代近二百人的学术观点,以备查询检核之用,其中并无褒贬,更无肯定与否定。至于戴氏的少量按语,后来皆散入其他著述中,更见其书非专著而是储材之作。如果以《经考》与《附录》大量摘录宋儒之说,即证明其肯定理学,为程朱信徒,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民国间编纂《安徽丛书》时,许承尧得到《经考附录》,并考定其为戴震之作。许氏以为《经考》与《经考附录》,皆为戴震“早年治学时札记之书,在先生未视为要籍,故段氏未之闻耳”。^[14]案许氏之说,反得其实情。戴震未视《经考》与《经考附录》为“要籍”,段玉裁亦未闻未见其师有此二书,故未刊入《戴氏遗书》中。

至于《戴震全书》整理者还认为,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谓“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即指此《经考》,笔者以为戴氏文中之“经考”,是泛指经学考辨著述,或另有所指,但绝非指此《经考》。如果是此《经考》,则不会有“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的情况出现,因为此二书中实在没有什么可令人“惊顾狂惑”的内容。^[15]

三、《声韵考》与《转语二十章》之关系

乾隆十二年(1747),戴震作《〈转语二十章〉序》,厥后临终前始成《声类表》,似乎二者间并无关联。故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论戴震“尚有《转语二十章》及《六书论》三卷《自序》,此二种遗稿未见”。段玉裁撰戴氏《年谱》亦云“惜此二书未成”。后孔继涵刻《戴氏遗书》,遂将《声类表》另刻,而以《〈转语二十章〉序》归入《文集》,至阮元《皇清经解》更割裂序文,仅存创例而尽删要言。自此以后,人们遂认定《转语》尚未成书,更认为其与《声类表》之间并无联系。实际上,《转语》与《声类表》为一书。

1. “转语”释义与《转语》之大旨

“转语”一词,始于《方言》。《方言》卷三:“庸谓之傚,转语也。”同书中此类尚多,郭璞注《方言》亦多言转语以释之。戴震因治《方言》而悟音读之变,《转语》书名,即由此出。戴氏论其著述目的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谓犹缺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16]此可见戴震著书之旨在于:其一,继《尔雅》《方言》《释名》诸书之后,著《转语》以明音声之理。其二,声韵结合,用声韵表的形式给声韵定位以求语

音转变之规律。其三,因声求义,以明假借。即段玉裁揣测的于“声音求训诂之书也”。

2.《转语》条例表析及《转语》与《声类表》之关系

戴震《〈转语二十章〉序》是为明《转语》体例而作,起着凡例的作用,他将三十六字母分为二十章,又分大限五(大类),每大限下设小限(小类)各四。其云:

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参伍之法:台、余、予、阳,自称之词,在次三章;吾、印、言、我,亦自称之词,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为一类,类有四位,三与十有五,数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位同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比之而通。

之所以如此说,是戴震认为“音之流变有古今,而声类大限无古今”^[17]。所谓大限,即喉、吻、舌、齿、唇五类;小限即又在每一类中按发、送、收(内收、外收)分为四小类,故五大类共二十小类组成二十章。同一大类中大限相同,故得相转称同位正转;大类不同但章次之位置相同称位同,位同则声变而通,故得相转称位同变转。如戴氏所举例中,“台、余、予、阳”在第一类第三章,属喻母,皆为第三位为位同,故声义并通。

戴震未言《转语》与《声类表》之关系即逝,最先解读戴氏之意的是洪榜,其《四声切韵表》即完全按戴氏条例而成,可惜未能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洪氏《初堂遗稿》云:

戴氏东原辨音最精,古所谓牙音、舌头、舌上、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音、半舌、半齿凡十类,今戴氏定为喉、吻、舌、齿、唇五类,较古法更为谐和,因立图于左。以微附喻、照附知、穿附彻、床附澄、娘附疑、敷附非。……

为明晰戴震之意及其分类,今按戴、洪之说,附以戴震类别章次,配以《声类表》第三“合口内转重声”中东、冬二韵字列表如下:

戴震古声正转变转图^[18]

戴震《声类表》已为学界共知,从上表可以明晰《转语》同《声类表》无论清浊、类别、章次以及声韵之位置皆若合符节,实为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在当时条件下,戴氏试图用这种方式将声与韵结合、语源与流变结合、音韵与训诂结合探讨,以达到其“各从乎声,以原其义”的目的。^[19]

四、《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真伪再议

大约十年前,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访书期间,得读该馆所藏清江永《善余堂文集》,为吴县潘氏宝山楼核钞本。当时是为笺释《汉学师承记》寻访资料,故未曾细读此钞本,仅钞录部分文章以及全书末所附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后来撰成《清人稀见著述十五种提要》与《新发现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佚文一篇》两文,向学术界介绍江永《善余堂文集》等书,并认为戴震《寿序》一文,“是研究江、戴学术与关系的重要文章”,“于江永学行有极高之评价,民国间学者以为戴氏不尊江氏之说,观此文亦当不攻而自破”。^[20]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对江永、戴震关系的再讨论,也引发了《善余堂文集》真伪的考辨与整理。例如台湾学者林胜彩教授发表《新发现戴震佚文与江、戴师生关系重探》一文,参考戴震《佚文》就江永、戴震师生关系进行再探讨;又如徐道彬教授发表《〈善余堂文集〉辨伪》,则认为该书真伪参杂,不可尽信。^[21]笔者在此,仅就道彬兄关于戴氏《寿文》的辨伪,发表一点个人浅见,至于江、戴关系,笔者将另文探究。

《善余堂文集》末附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应为乾隆十五年(1750)江永七十寿诞时戴震所撰,对江氏学行进行总结与赞扬。道彬兄认为该文可疑,列为八证:

首先,由江锦波《江慎修先生年谱》和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皆不载此事此文,《戴东原先生遗书》亦不收录此文。乾隆十五年,江、戴从时间、地域和行事上来说,二人此时聚合也有一定难度。其次,文章既然是为江永七十大寿作序,那么文中就不能出现有江永70岁以后才写成的书。第三,文中谈到江氏《礼书纲目》时,谓“前大中丞赵公暨礼馆所抄者,特其梗概”,而江氏《年谱》谓其41岁时此书已成,如何说是“特其梗概”?第四,文中开篇的学术史论,对郑玄、朱熹的评价,与其后来所言明显有所抵牾,应当不是出于一人之口,他所论矛盾处亦多。第五,从整篇的文理气势来看,28岁的戴震却比40多岁的戴震写的《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更为高屋建瓴,提要钩玄,他处可疑者尚多,不似东原所为,如其用词尤为突出“吾师”、“及门”和“门人”,与《事略状》的通篇仅用“先生”一词,轻重显然有别,耐人寻味。第六,戴文称“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所读诸经,往来问难,承口讲指画,然后确然见经学之本末”,而江氏《年谱》十八年所载“馆歙邑西溪,歙门人方矩,休宁郑牧、戴震,殷勤问难,必候口讲指画”如此相同的描述,是巧合还是相袭,不得而知。又文中结语“自兹以往,年益高,学益进,自有不朽大业藏名山、留宇宙”,与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的结语,何

其相似。第七,70岁的江永,亲属门生众多,有名望者不在少数。若为寿辰作序,为何独存了这当时连个秀才都不是的戴震之文?而江锦波为其祖做年谱时,戴震已名满天下,为何谱中对此事不著一词?第八,当初《制言》第七期已刊载了江永《答戴生东原书》,而潘承弼为何不选登这封对当时的学术争论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信札呢?诸多疑点,值得玩味。

案道彬兄对《寿文》的怀疑,并皆有理,然亦颇有可商之处。何者?其一,江、戴《年谱》及《戴氏遗书》不载其事其文,可证江锦波、段玉裁未见此文,故不载《年谱》,并不能证明此文不存在;江、戴二人乾隆十五年是否相见,不得确证,然亦可反推,既无证据明其未见,则见与不见,皆有可能。其二,道彬兄谓江氏70岁后所著书,不当预为出现于寿文中;然无论今古人著书,或草创数十年,大纲颇具,而细目则留待将来,或已有成文数篇、数卷,乃常有之事,江、戴既为师徒,则论学所及,知其师有此数书,寿文为增光尊宠,笼统称为全书,亦未为不可。其三,戴氏言《礼书纲目》时所见者“特其梗概”,道彬兄谓江书早成完足,称“梗概”未确;考“梗概”二字,既可言简略不全之谓,亦可言大致粗备之谓,戴氏明言“尚欲博采众说而论定之”,则此“梗概”谓江氏纲目粗备,续有心得发明,当补全书不逮之义也。其四,道彬兄谓戴序开篇学术史论,“对郑氏、朱子推崇备至”,与戴氏一贯主张郑、朱“得失中判”之说不符;又谓其论清初诸人之说,与汪中说“极其相似”。然考戴氏寿文前述汉宋之学,以郑玄、朱子为代表,其所论者汉、宋各具之长,未及论其各自之失;又其论清初诸人,其说与王鸣盛、钱大昕诸家之说,大致类似,惟汪中总结诸人说而为说。故戴氏此说适得证其为当时考据学家之语,且与其前后之说并不矛盾。其五,道彬兄依“文理气势”推测,《寿文》可能采自《事略状》。然反其意言之,何不可言《事略状》乃《寿序》基础上修改而成?至于两文对江氏称谓有别,则一为门人贺师长寿文,称“吾师”、“及门”和“门人”,亲切有味;一为活弟子述死先生行状,称“先生”乃惯例,其中并无“轻重有别”与“耐人寻味”处。其六,道彬兄谓戴文与江氏《年谱》及王国维文末相似,涉嫌抄袭。然述同一事,相同乃正常,不同才非正常;而王国维文与戴氏文末,笔者以为大大不同,无抄袭雷同者可言。其七,道彬兄疑戴震当时不具独撰寿文之资格,然江、戴师徒,论学相合,意气相投,且戴氏之学,深受江氏所赏,非以功名爵利可比量,故戴氏撰文,并非不可,且此文既可以为公推所撰,亦可认为乃戴氏私撰,并非一定要公诸于人;至于江氏《年谱》不载,前已述之,则因未见之故也。其八,道彬兄以潘承弼《制言》不载戴文,推断潘氏疑江氏文稿之不真,故谨慎起见,不予采入。然潘氏乃藏书大家,宋槧元刻,皆列架中,《善余堂文集》在其藏书中,不过普通之一钞本。其编选《制言》时,仅择其赏鉴者而辑入,并不能证明其对不入选者持不信任的态度,更不能认为其以伪书待之也。^[22]

因此,笔者认为仅从戴震《寿文》单篇文字来判断,应当不假。退一步说,即便《善余堂文集》真假参半,也不能完全断定《寿文》为后人伪作。

五、关于戴震早岁与晚年的学术取向

前已论之,《戴震全书》的整理者在《经考附录》之《说明》中谓“《经考附录》更鲜明地反映了戴震早期的学术路向,反映了戴震对程朱理学持坚定信仰的态度”^[23]。我们已经讨论了《经考》与《经考附录》不能证明戴震早期的学术取向。但乾嘉学者多有宋学背景,此点也不用怀疑与回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学术宗尚方面虽汉宋兼采,但顾炎武反对陆、王,修正程、朱;黄宗羲修正陆、王,反对程、朱;王夫之则宗师张载,修正程、朱,反对陆、王。^[24]其根柢皆为宋明理学系统中人物。同时之张尔岐,其学亦“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袭语录”^[25]。至乾嘉考据学家,自惠栋始,师法汉儒,标举“汉学”,排斥宋学,几与宋儒划清界线,此世人皆知。然细考其学术渊源,实与宋学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不少学者有宋学背景,此则或为时人隐而讳之,或为后人所忽略不道。^[26]

例如,惠栋是高举“汉学”大旗的第一人,对宋代经学大加排斥,甚至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但对宋儒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却采取肯定的态度并树为楷模。即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27]。又如王昶“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言性道则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阳明诸家”^[28]。其从清军征川藏,襄赞机务,战事结束,“大兵久撤,幕府清闲,乃借《性理大全》《语类》《或问》《王文成公集》读之,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行之要。”^[29]又如卢文弨为桑调元婿,其自述称“弱冠执经于桑弢甫先生之门,闻先生说《中庸》大义,支分节解,纲举目张,而中间脉络无不通贯融洽,先生固以为所得于朱子者如是。盖先生少师事姚江劳麟书(史)先生,劳先生之学,一以朱子为归,躬行实践,所言皆见道之言,虽生阳明之里,余焰犹炽,而独卓然不为异说所惑。”^[30]然则卢氏之学,初亦为宋学根底。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至于江永、戴震之学,本出自朱子故里,有深深的宋学烙印,江氏有《近思录集注》14卷,《河洛精蕴》9卷等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其《放生杀生现报录》,甚至讲因果报应之说(徐道彬兄认为该书是伪书)。戴震虽然痛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但不废性理,以闻道为治学之终极目标。

因此,无论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儒,虽然对朱子多有讥讽,对宋代经学与理学持否定的态度,但对宋儒立身致行之学并不否定,且见诸行事。当时并未出现“汉贼不两立”的绝对状态,有之则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始。章学诚论乾嘉考据学家,亦谓“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31]。因此,乾嘉考据学家一方面坚主汉学,反对宋学;但同时宋儒修身诚意之学并未全盘抹杀。惠栋曾说:“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荀卿称周公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32]后人执此言以为惠栋不反理学,实际上惠氏所指理学指宋儒修身诚意之学。换言之,即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即他所谓“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一,非学也。”^[33]这句

话可以认为是惠栋对上句话的最好注解。之所以提倡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倡;经术之士,汨于利而行不笃”的弊端。^[34]这正是惠栋父子在立身制行方面崇尚宋儒的原因,也是惠氏将“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书为楹联而父子皆遵行不悖的思想背景和合理解释。明白此旨,我们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言行,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也有人认为,戴震晚年悔其治考据反更深,如焦循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云:

王惕甫《未定稿》载上元戴衍善言戴东原临终之言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固引以为排斥古学之证。江都焦循曰:非也。凡人嗜好所在,精气注之。游魂虽变,而灵必属此,况临歿之际哉。……东原生平所著书,唯《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知其讲求于是者,必深有所得,故临歿之时,往来于心。则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35]

焦氏此言适得其实,戴震认为自己所论为直承孟子,而绝非宋儒之学。然究其实亦非孟子之义理,而是戴氏自己的义理。

因此,就乾嘉学者而言,他们多数都有着一定的宋学背景,对宋学也并非一概抹杀,此其中可分三层:对宋代经学,他们基本持否定态度;对理学中的“天理”、“人欲”诸说,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而对宋儒正心诚意之学,则持肯定的态度。明白乎此,我们也就不必过意在乎戴震早岁还是晚年的学术取向,究竟是尊程朱还是尊汉学,也就明白了他既严斥宋儒“以理杀人”,又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因为此“汉学”非彼“汉学”,此“义理”亦非彼“义理”矣。

注释:

[1][3][清]戴震:《戴震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赵玉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9-140、140页。

[2][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状》,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3页。

[4][清]戴震:《勾股割圆记》(下)附托名吴思孝《〈勾股割圆记〉序》,《戴震全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1页。

[5][清]戴震:《戴震文集》卷9《答朱方伯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8页。

[6][清]戴震:《戴震文集》卷6《〈水经郦道元注〉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2页。

[7][清]戴震:《戴震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沈〉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5页。

[8][清]戴震:《与段若膺论理书》,《戴震全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9][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全译》,冒怀辛译,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27页。

[10]以上所论,可详参拙著《乾嘉考据学研究》第六章《戴震考据学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0-181页。

[11][13][清]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经考》整理《说明》,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188-189、

188 页。

[12][23][清]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经考附录》整理《说明》,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65、365页。

[14][清]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经考附录》整理《说明》中引许承尧跋语,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63页。

[15]详参拙文《古籍稿本的文本解读:是学术专著?还是资料汇编?——以清代学者惠栋、戴震著述为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9-326页。

[16][19][清]戴震:《戴震文集》卷4《〈转语二十章〉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2、92页。

[17][清]戴震:《戴震文集》卷4《书〈广韵目录〉后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0页。

[18]案:洪榜以后,研究戴震古声之学者有江陵曾广源,其著《戴东原转语释补》,疏通证明戴氏条例,所论更详。又曾运乾亦云“实则戴氏《声类表》,即《转语二十章》也”。郭晋稀先生对曾氏之意又有阐发,并列表明示(皆见郭先生《声类疏证·前言》)。但各家所论皆有微疵:曾广源《转语五音清浊分行表》以“微”附“明”,误。戴震《声类表》中如“文韵”之“合口内转轻声”表中“分、粉、粪、弗”属明母在第五类第十九位,而“文、吻、问、物”属微母在第一类第三位。“微韵”之“合口内转轻声”表中“非、匪、沸、弗”、“微、尾、未、物”亦如之,等等。可见戴氏是以“微”附“喻”,洪榜的做法符合戴氏原意。然洪氏以“娘”附“疑”,亦误。又郭晋稀先生以“心”母为第四类第十五小类,亦误,依戴氏意当为第四类第十六小类。

[20]详参拙文《清人稀见著述十五种提要》,载《文献》2005年第3期,第189-190页;《新发现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佚文一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第122-123页。

[21]详参林胜彩:《新发现戴震佚文与江、戴师生关系重探》,《文与哲》2005年第5期,第219-237页;徐道彬:《〈善余堂文集〉辨伪》,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第45-53页。

[22]林胜彩:《代序——江永〈善余堂文集〉的文献研究》所言,与笔者所论大致相合。可参其整理之《善余堂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第16-19页。

[24]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86-887页。

[25]钱载:《张处士尔歧墓表》,见《碑传集》卷130,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875页。

[26]详参拙文《乾嘉考据学新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04-111页。

[27][清]王昶:《春融堂集》卷22《为顾秀才千里广圻题其兄抱冲小读书堆图》,《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37册,第587页。

[28][清]阮元:《诒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碑传集》卷36,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3页。

[29][清]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上乾隆三十六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页。

[30][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1《中庸图说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0页。

[31][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朱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32][清]惠栋:《九曜斋笔记》卷2“汉宋”条,清《聚学轩丛书》本。

[33][清]惠栋:《九曜斋笔记》卷2“趋庭录”条,清《聚学轩丛书》本。

[34][清]惠栋撰、漆永祥整理:《松崖文钞》卷2《沈君果堂墓志铭》,《东吴三惠诗文集》本,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第345页。

[35][清]焦循:《雕菰集》卷7《申戴》,上册,刘建臻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125页。

[责任编辑:黎虹]